

# 长歌浩浩 戚戚之尤<sup>\*</sup>

## ——试析柳宗元诗歌中的激愤意识

龙坚毅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柳宗元的许多诗歌作品蕴含了强烈的激愤意识。作者往往借助于历史神话、山水景物对其加以表现。同时代的韩愈、刘禹锡也有类似的激愤意识, 由于他们的生活背景、心理机制以及审美追求不同, 表现在创作上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关键词:** 柳宗元; 诗歌; 激愤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30(2000)03—0029—02

柳宗元的诗歌一向以萧散冲淡、温丽精深著称。后人常以韦柳、韦陶并称, 有人甚至说:“学韦、柳诗, 须先养其性气, 倘峥嵘之气未化, 豪荡之性未除, 非但不能学, 且不能读。”(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二)但是柳宗元的诗歌果真峥嵘之气已化? 豪荡之气已除? 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诗论家之所以把柳宗元和陶渊明、韦应物相提并论, 只是因为看到三人的某些诗作在题材、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 而没有看到在文字下面蕴含着不同的精神实质, 虽然柳宗元大多数诗歌读起来让人感到简洁清新、恬淡自如, 但其含义深沉委婉、扣人心弦, 常给人一种高秋独眺、霁晚高吹的悲怆。正如他自己所说:“嘻笑之怒, 甚于裂眦; 长歌之哀, 过于恸哭, 庸讵知吾之浩浩, 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可见, 诗人表面上的达观开朗, 实际上是痛苦之至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 那些表面看起来疏朗恬淡之作往往蕴含了强烈的激愤之情。

在柳宗元的诗歌中, 他的激愤意识很少直接抒发, 而是采取曲折的方式, 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去体会。在《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中“我歌诚自恸, 非独为君悲”这句诗, 表明诗人不只是表达对永贞革新派——凌准的同情, 更多的是抒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以及对“废逐人所弃, 遂为鬼神欺”的现实的不平与愤懑。除了借现实中的人和事寄托个人身世感慨, 诗人还借助历史神话、山水景物来曲折表现这种情绪。《行路难》就借助夸父追日的神话, 赞颂了永贞革新的惊天动地的壮举以及革新派的大无畏精神。诗中“须臾力尽道渴死, 狐鼠蜂蚁争吞噬”则表现了政敌们蜂涌而上, 对革新派落

井下石的现实, 而“北方辩人长九寸, 开口抵掌更笑喧”刻画了得志小人的丑态, 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鄙夷之情和对这种现实的愤怒之情。《笼鹰词》《歧乌词》《放鹧鸪词》等诗歌借禽鸟自况身世, 也是类似的寓言诗。诗人的咏古诗同样托古讽今, 《咏史》借乐毅的历史故事自比, 讽刺了宪宗迫害打击革新派的行径。《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咏三良》也是类似作品。此外, 作者寄情景, 在写景状物中曲折表现他内心的激愤意识。“投迹山水地, 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首》)。可见, 在他纵情山水时, 却深藏着和屈原一样的愤愤的情绪。“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描写的不仅是大自然中的暴风雨, 更是政治斗争中血雨腥风的反映。《江雪》通过漫天飞雪、人鸟绝迹、孤舟独钓的景色曲折地反映了诗人那种孤高不徇俗流而又倍感寂寥的心境。《入黄溪闻猿》中“孤臣泪已尽, 虚作断肠声”, 欲哭无泪, 这里面蕴含了诗人多少悲苦和怨愤。大多数时候, 诗人出语平淡, 但就在平白如话的叙述中, 我们同样可以体会他心中的愤慨。如《再上湘江》“好在湘江水, 今朝又重来。不知从此去, 更遣几时回。”诗句短小, 语言浅显, 但联系诗人当时的处境, 我们就能体会其深刻的含义。当年贬谪永州, 作者曾经过这里, 一贬十一年, 好不容易被召回长安, 却很快被贬到更远的柳州。本来满怀希望与欣喜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当再次经过湘江时, 作者似乎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如同眼前的湘江水, 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今朝又重来”中“又”字我们可以读出作者的失望、怅惘

\* 收稿日期: 1999-04-01

作者简介: 龙坚毅(1971—), 女, 江西永新人, 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文学

和愤懑。

“穷而后工”“不平则鸣”，柳宗元诗歌中强烈的激愤意识的出现与他的坎坷的经历有关。宋代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概括了他坎坷的一生：“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永贞之初得一礼部郎，席不暇暖，即斥去为永州司马，在贬所历十一年。至宪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师，喜而成咏……即至都，乃复不得用。以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复六千，往返殆万里矣。子厚之穷极矣！……然竟不得生还，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可胜叹哉！”可见由于诗人一贬再贬，久弃边荒，沉冤难申，壮志难酬，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激愤之情，“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李贽《焚书》）诗歌贵在风骨，而柳宗元诗歌的“风骨”就在于他的激愤之情。正是他内心的这种感情，使他和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山水田园诗人区分开来，形成了自己清峻迥拔的独特风格。

“愤怒出诗人”，许多诗人都有因身世坎坷而激发出来的愤懑情绪。比如唐朝的李白、韩愈，宋朝的欧阳修、苏轼等著名文人和柳宗元一样都曾有过贬谪的经历。怀才不遇的“激愤应该是许多文人共同的情绪，但作品呈现的风格却各不相同。柳宗元为什么独独呈现萧散冲淡、温丽精深的风格？这与个人经历、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以韩愈、刘禹锡与柳宗元为例，三者生活时代相同，皆有贬谪生活的经历，并在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及愤懑之情，但他们的诗歌呈现的风格却大不一样。现将他们各自的生活背景、心理机制及审美追求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来探寻柳宗元诗作呈现萧散冲淡风格的成因。

首先，他们的生活背景不同。韩愈虽有科场屡败，三次贬谪的经历，但终其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顺利的。柳宗元则不同，他是永贞革新的骨干力量，以宪宗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他的打击是严酷而无情的。“二王八司马”除了王叔文赐死外，其余的皆贬谪边远的地方。柳宗元曾希望能重返京城，再展抱负。但朝廷多次大赦，“八司马”均不在宽赦之列，于是贬谪永州十一年，以后又再次贬斥柳州，最后死在贬所，再无出关之日。刘禹锡虽同属被贬之列，在宪宗统治时期他也一直受贬，但在宪宗之后，他的境遇有所好转，曾作过太子宾客、检校礼部尚书之类的高官。通过三人比较，只有柳宗元始终生活在深重的政治压迫之下，政敌们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柳宗元终日如履薄冰，只好将满腔的愤怒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只有当我们反复吟咏他的诗句时，才感觉到他诗中浓厚的郁闷之气。

其次，他们的心理机制不一样。韩愈好奇尚险，率直外向，而柳宗元则从容恬淡，谦逊含蓄，比如对待“为人师”的态度，韩愈不顾世人讥议，抗颜为师，并作《师说》昭示天

下；而柳宗元虽也奖掖后进，但却竭力去“师名”，以免引起“群怪聚骂，指目牵引”（《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刘禹锡祖先为胡人，性格豪放，少时博览“九流”“百家”之书，思想上强调人的主动性，常常以辛辣的笔调回击政敌，如：“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城赠看花诸君子》）“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等诗极尽嘲弄之语。柳宗元崇信佛教，佛学思想不知不觉地渗透了他的言行中，如：“然后知其动而无不虛，静无不为，生而未始末，歿而未始往也。”（《南岳云峰寺和尚碑》）正因有了这样的思想影响，所以柳宗元在为人处世、写诗作文方面都竭力“内敛”。面对政敌的迫害，柳宗元的《跛乌词》写道：“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妒尔令尔疾？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祸患”，诗中以一种避祸求全的口吻表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激愤之情。由于柳宗元这种内敛的心理机制，使他的诗歌风格没有因为激愤走向险怪豪放，而着意选择了疏朗恬淡的模式，呈现出与韦、陶相似的风格。

第三，诗人的审美追求不同。韩愈推崇李白、杜甫，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他的钦慕之情，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醉留东野》）。可见韩愈渴望在精神上与他们交流，在创作上能向他们学习。李白诗歌的清雄豪放、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深深地影响了韩愈的创作。在此基础上，韩愈开辟了一条奇崛险怪的诗歌道路。刘禹锡虽有学屈原、阮籍之作，但他受民歌影响较大。刘禹锡现存的大量诗作，多是贬谪以后写的。而他被贬谪的地方，无论是“武陵溪洞”，还是“巴山楚水”，都盛产民歌。这些民歌引起了刘禹锡极大的兴趣。他仿效民歌，创作了《竹枝词》《杨柳枝词》等一系列民歌。民歌中淳朴健康的情调、天真自然的语言对刘禹锡的豪放清峻的风格影响较大。柳宗元深于骚学，出入陶谢，他的“平野青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岫嵯岭”（《零陵春望》）；“菡萏溢嘉色，萋萋遗清班”（《构法华寺西亭》）；“雾暗水连阶，日明花覆牖”（《法华寺西亭夜饮》）等诗句，“其律全似谢临川”（《笔墨闲录》），而他的《田家》《饮酒》也绝有渊明风味（《笔墨闲录》）。陶谢二人，一为婉丽，一为简淡，虽相反实相成。柳宗元深受二人影响，所以他的诗歌“收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通过三位诗人比较，我们了解了柳宗元诗歌虽然以萧散冲淡、温丽精深的风格出现，但是却深藏着强烈的激愤意识。而作者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风格，与他的生活背景、心理机制以及审美追求有关。

〔责任编辑 赵永建〕